

张艺谋：毕生在中国本土拍中国电影

台湾记者笔下的李登辉

日本会重新武装吗？

变动着的中国阶层

与邓小平打桥牌

本谈爱情

讀者

3
950615 WC

吉林出版社

外滩

目 录

观察与思考

- 4 变动着的中国阶层
- 10 城乡平等化
——理性与正义的要求

天下事

- 13 车臣与俄罗斯的恩恩怨怨
- 14 波黑战火何时了?
- 18 法国情报部门是怎样识破
美国间谍的?

二战风云录

- 23 日落东方
- 31 力挽狂澜的丘吉尔
- 34 二战名将轶闻录
- 35 “南京大屠杀”的真正
元凶

人物

- 36 世界桥牌皇后杨小燕谈
与邓小平打桥牌
- 38 曾宪梓：家庭作坊里创出
金利来
- 42 新风霞
- 45 台湾记者笔下的李登辉

热点透视

- 48 告别“仿制”——中国人还
能用上好药吗?

- 52 民工潮的社会效应
- 54 震了日本，醒了中国?

往事钩沉

- 57 中美通航始末
- 61 壮士一去不复还
——回顾金门战斗

随感录

- 65 “救灾酒”
- 66 房宽不如心宽
- 67 反过来想

世态风情

- 68 不谈爱情
- 70 潮起潮落话兼职
- 73 旅途中的“老外”
- 77 主治医生本姓钱

婚恋与家庭

- 79 赵忠祥：闲言碎语话家庭
- 80 胡宗南的四次婚恋
- 86 男人，你了解我们女人吗?

改革与国情

- 89 国家将强制推行失业保险
- 9 国家将全面清理商品定价
- 89 国有资产，每天流失一亿
元

12 李伯勇谈我国“九五”工资改革

90 深圳将给三资企业以国民待遇

99 北京：“大病统筹”实行在即

91 我国将为公费医疗开大处方

经济生活

92 换位的城乡消费

93 《福布斯》公布我国大陆富豪榜

94 十大城市居民收入新座次

94 世界最佳生活模式

文化广场

95 《三国演义》里的“前现代”

98 毕生在中国本土拍中国电影

——与张艺谋谈电影

103 游戏节目：对大众智商的全面贬抑

作家与作品

105 无法回避的追问

109 女作家们在干什么？

中外书摘

111 Y 先生语录

115 日本会重新武装吗？

港澳台之窗

120 香港：办公室压力最大的都市

123 台湾政坛怪现象——迷信

国外见闻

125 杨澜：感知美国

128 现代日本艺妓生活一瞥

130 圣地耶路撒冷

132 荷兰：欲将桑田变沧海

人与自然

133 臭氧层——人类生存的保护伞

135 太阳能：下世纪的主要能源

135 环境污染导致阴盛阳衰

教育园地

137 慈父家训

138 一位优秀教师给家长的十条建议

体育天地

139 北京准备申办 2004 年奥运会

140 张路——第一足球侃爷

141 闷蛋桑普拉斯

百科知识

- 132 世界军队知多少?
- 143 电脑将取代电视?
- 144 集邮新趣: 极限集邮
- 146 民族性格与国花
- 146 生命也在于静养
- 147 人体二十四小时工作表
- 149 有些中西药不能同时服
- 150 封闭阳台应从健康考虑
- 150 如何阅读统计公报?

九州方圆

- 152 我国经济重心继续南移
- 153 沿海城市“广场热”
- 153 有关方面决定修建琼粤铁路

- 154 中国兵器城
- 154 广东城里人下乡当保姆
- 155 深圳办起“自行车俱乐部”
- 155 全球钟表生产中心转向深圳
- 155 开封的“犹太人问题”
- 156 济宁汉碑半天下

新论点

- 157 未来十年我国政治经济走势
 - 157 农业滑坡的症结在哪里?
 - 158 建立自由贸易区
 - 158 中国应在中部再造特区
 - 159 中国社会三大层面的变迁
 - 159 历史现实主义的审美倾向
 - 160 试论“东方情调”的审美意义
-

变动着的中国阶层

高晓岩

《1994—1995 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一书日前问世了，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连续第三个年度报告。社会蓝皮书在全面系统地对中国社会形势演变的各主要方面及其基本趋势进行了分析与预测的同时，还对现阶段社会大众进行了引人关注的“层次划分”。

蓝皮书在取样分析中，使用了“工人、农民、机关干部、专业技术人员、国有企业家、私营企业家、个体户、自由职业者、其他”的阶层划分，尽管这样的划分还不足以十分真实地反映今天的社会现实，但却可以引导人们去观察、思索。

多种多样的生活形态

记者在围绕这个问题所进行的采访中发现，每个被采访者事实上都有很明确的阶层归属感，有与自己收入相适应的生活方式，有强烈的往上走的渴求和冲动。（尊重被采访者的意愿，以字母代替姓名。）

P 先生是某外资银行的高级雇员，年收入上万美金，全家住公寓房，全套进口家电用具，雇用保姆，

工作之外每年有一定的假期，P 先生带全家环球旅游。P 先生把自己划入西方的“中产阶级”之列，期望能拥有更多的股份，最终成为有决定权的资本发言人。上下班打的，而且必须打最好的车，“这关系到公司的形象，老板看见你打不好的车子，会温和地警告你。”出外必住五星级大饭店。而且处处给小费，让人感到财大气粗。对 P 先生而言，已不存在什么国界线了，一登上飞机，全世界到处都是“乐土”。他用的语词中常常有“大陆”、“国内”、“上海”、“北京”，唯独没有“咱们中国”。

K 女士先前嫁与港商，几年间攒下几十万私房钱，找了个理由离婚后，也有了房产。她带着女儿生活，雇了个老保姆，琐事一概不操心，又给女儿请了钢琴和英文教师，一切都安排好了。K 女士担心坐吃山空，便做起了股票。她的运气总是很好，因为她总是在最低点购进，差不多时抛出，不贪，最简单的逻辑产生了很有点意思的收获。K 女士有几十套高档时装，几十双鞋子，自己买了车，出入于豪华娱乐场所，

社会交际极广，她对自己的生活很满意，惟一希望的是，有朝一日能有一个阔绰的白马王子走进她的生活。“我喜欢最好的，买东西从不讨价还价，只要看中了就买。我给女儿买最好最贵的进口食品，跟她说英语，长大了把她送到国外最好的大学去。”

身为国家干部的N先生，一切就简单多了。住有单位里分的二室一厅，上下班有班车，偶尔下去检查检查，回家满面红光，土特产一兜又一兜。工资虽不高，但好多地方不用花钱，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彩电、音响虽说是国产的，但也是响当当的牌子。

Z女士已届中年，在粮店上班。丈夫原来是干石油的，在河北农村打井，经人介绍认识了，结婚几年后，丈夫因公致残，回到了老家北京，不久也将Z办回了京城。Z女士一家住在简易楼里，屋里除了14寸黑白电视、冰箱、收音机装点着一丝现代化色彩外，家具衣物都简陋不堪，每日间烙饼、炸酱面地吃，周末炖一大锅排骨，一家人也过得有滋有味。Z女士每天下午去直销市场，买最便宜的菜蔬回来；粮店里经常发些粮食和半成品（馒头、挂面、炸糕）之类的，日子也过得平平安安。Z女士希望单位里能尽快分给她一套单元房。Z女士的女儿刚读小学五年级，她写得一手好毛笔字，她很认真地对记者说：“我长大要挣很多很多钱，买一幢八

仙新村那样的别墅给妈妈住。”

钱已经成为人们口语中使用频率极高的一个词，中国大陆也已经有了数位亿万富豪，但人们对发财的人却颇有看法。《中国青年报》的“北京青年面面观”调查结果表明：22.9%的人认为多数大款发的是不义之财，28.1%的人比较赞成这一说法。

财产、阶层、继承和 安全感……

人们已经或多或少感到了社会的变化，但对种种变化并不能坦然相对，有的甚至产生了莫名的焦躁和困扰。为此，记者邀请蓝皮书的主持人陆建华博士和社会批评家何家栋先生就此发表看法。

记者：现在人们已经广泛使用“工薪阶层”这个词了，与此同时还有“白领”、“大款”、“息爷”等不少词汇也进入了人们的口语系统中，主流传媒则强调“工人阶级”，这些各有其意的称呼，仿佛暗示着有必要重新划分中国的社会阶层了。几十年前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曾经把当时中国社会分为：1. 地主阶级、买办阶级；2. 中产阶级或民族资产阶级；3. 小资产阶级；4. 半无产阶级；5. 无产阶级；6. 游民无产者等六个阶层。毛的阶级划分理论影响了中国半个多世纪，至今仍不能说没有影响。那么社会学家是依据什么划分阶

层，又如何解释这些现象呢？

陆建华：国际上往往从收入、声望、权力三个方面来划分阶层，这是一个综合评估体系。我们现在流行用收入划分阶层，这是一个进步，但我们的分层体系还远远没有完善，我们还没有学会用声望和权力来划分阶层。一个社会的分层应以效率为主，然后才是公平。社会用奖励的办法，让有能力的人进入高一级的阶层，不同的学识在分工体系中各就其位，取得相应的报酬。现在好多人有不公平感，我承认我们的分工确实有不合理不公平的地方，但我认为他们更多的是由于不知道分层是一个自然的结果，是社会构成和发展的基本需要，他们是夸大了这种不满。现在还在用工人阶级、农民阶级这些词，但含义谁也说不清，而且已经变化。在一个合理的社会体系中，工人是分层的自然结果。沦落到低收入，他不会有不公平感，但他照样对工作尽职尽责。一个人一旦从事了这种职业，就必须把它干好，这是职业的要求。

有几个因素加快了分层的进程：一是《继承法》通过后，个人财产得到法律保护。原来财产权不明确，财产拥有者没有安全感。但《继承法》比较苛刻，它主要是从征收遗产税方面考虑的。有了这个法，有一部分人靠资产的继承就能成为富翁。（何家栋：毛泽东的阶级分析，根据的是列宁主义人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情况作出的。日本的资本主义

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措施，那就是长子继承权。一个家族中只有长子有继承权，父亲辞世后，长子继承一切财富，其余的都被赶出去，这样保证了资本的完整。咱们现在的《继承法》，人人都有份，资本就分散了。最后都成了小生产者，没有投资的可能性。）二是雇佣关系的形成。1985年刚刚开始有雇佣关系，那个时候中央提出了八个人以上算剥削，八个人以下不算的政策。（何家栋：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一书中对剩余价值的分析。这在当时是对已经出现的雇工现象的引经据典的解释。）其实，人和人的关系，两个以上就起变化，数量关系不能机械地照搬套用。

记者：那么，私营企业家和个体户的区别在什么地方？

何家栋：（哈哈大笑！）八个上下！

记者：现在是否已经出现了大款阶层？

陆建华：据我们对高收入层的调查，这个阶层包括下面几种人：

1. 歌星、明星；2. 经纪人；3. 科技实业家；4. 外资企业高级职员；5. 承包人；6. 私人乡镇企业家；7. 期货、股票人。调查结果还有：年收入100万以上的人有100万户，实际上这个数字乘以三还保守。一亿元以上有70多人，但广东有钱的不让报道，反倒一个也没有。《公司法》实施后，广东的私营企业家想与原靠挂的单位脱钩。

贫困层的出现和各 阶层对现状的态度

记者：春节的时候，全总按惯例搞了一个“送温暖”工程，这是否意味着有一部分职工已经处于贫困线上？

陆建华：贫困阶层已经出现，全国有8000万，其中城市有1200万，被叫做困难职工。困难职工的收入低于当地的生活水准，北京月收入150元（不包括进城农民）。去年9月份的统计表明，辽宁月收入65元的有3.5万人，85元的有7万人。农民的情况就更复杂了，水平可能更低了。

记者：蓝皮书有改革受益者的排行，那么那些被认为是受益者的阶层又如何看待社会分层？

陆建华：我们的调查表明：在体制外，非国有受益最多；各个阶层对这种状况存在着相当矛盾的心理，他们认为不可避免但很多人又不满。跟国际上相比，根据经济起飞的思路，我国公民目前收入之间的差距处中下等水平，按这种经济增长，差距还会加大。到一定阶段，才会慢慢下降。有受益者就有受损者，受损阶层对社会分层普遍不满，怨气冲天，对社会公平失去了信心。其中工人的怨气比较大。进城农民也有怨气，但还抱有一线希望。

工人的体验切身、认真，议论很多。

知识分子不知出于什么考虑，

不从理性上批判这种分层，又提不出具体建议。

对改革不满的人则借机发难。

机关部分分化得比较厉害。年轻的人心不稳，不适应这种变化。（何家栋：有重新选择的问题。）中年人有一些用权力或关系网为自己谋私利，一定时候跳槽大干一把。原因是公务员制度流于形式，缺乏职业运转机制。（何家栋：有人提出高薪养廉，我有点怀疑，关键是要有规则，有社会监督机制。）

在职业声望调查中，我们发现干部已排在企业家、艺人、实业科技人员、经纪人之后。

权力和组织的发育

记者：据报道，美国50万个家庭现在拥有美国全部资产（股票、债券、现金、人寿保险单、珍宝等）的29.5%，这使美国在发达国家中收入悬殊方面排第一位。俄罗斯贫富差别扩大，30%的俄罗斯人月收入125美元，《消息报》的调查表明，28%的俄罗斯人希望大款们统统被杀掉。我国目前的收入差距会不会导致社会变动？

陆建华：现在的差距虽不会直接引发社会动乱，但可能成为中介因素。广州、北京的调查表明，越有钱的人安全感越少。不法之徒用绑票等手段谋取钱财，给很多富人心头留下阴影。有意思的是，在南方，贫富之间没有产生明显的敌对情绪。

记者：富有阶层在多大程度上会提出自己的政治要求？

陆建华：他们通过各种合法或非法的方式寻找代理人，这很正常。他们或资助某一学术机构，或资助一些重大的内部研究。

记者：1989年以前，知识界关于“中产阶级”的争论非常激烈，有学者认为，按照欧美模式，中国的“中产阶级”应该占60%。后来又有许多学者讨论“市民社会”，主张在政府和老百姓之间建立一种社会组织，来调解各种冲突……

陆建华：“市民社会”是一个很好的设想。好多问题有待于完善的社会组织去解决。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工人就是被雇佣者，工会的作用是要维护他们的各种权益。政府、工会和工人应该是铁三角关系。

何家栋：刘少奇说过，工会有存在的理由，就是由于工人有经济的要求。利益多元化，工人的利益有时跟国家一致，有时又不尽相同，农民也是这样。特权没有消灭，就产生不公平感。有些人只享特权不尽义务，有些人却只尽义务而没有权利。

陆建华：农民处于弱势，缺少经济利益代表组织，譬如棉花协会等等。农民面临的四种困扰（价格纠纷、宅基地、摊派、家庭婚姻琐事等）往往无法得到有效的帮助和解决。

记者：河南南街村这两年成了以不变应万变的样板，在原有人民

公社的构架内发展经济，“向共产主义小社区过渡”，他们建立了各种组织，雇佣邻村外省廉价劳动力保证“乌托邦”的经济利润，农民的欲求、自发性全丧失了，变成了被组织起来的劳动者和消费者。

何家栋：《劳动法》真正实行了，劳动力优势就消失了。社会组织处于发育阶段。低收入阶层易形成流氓、黑社会组织。但政府对社会组织的观念有一个改变的问题。政府应该明白：它和每个人打交道是不可能的，社会组织不健全，各种丑陋现象越难以根除。譬如同业工会就可以解决假冒伪劣问题，同业工会有自我约束、自我保护的能力和作用。

陆建华：社会组织的多层次也是个很重要的问题，有了多层次的社会组织，活力和稳定都有了。

何家栋：现在政府放权没放到社会上去，“小政府，大社会”就只能是个空头口号。

陆建华：各种权力被垄断了，好多棘手问题都无法很好解决。社会治安光增加警力还不够，必须建立市民自己的自卫组织。市民应该享有自卫的权利。

何家栋：社会组织建立起来了，政府就干该干的事情去了。

市场经济需要公正

记者：目前这种状况的出现，政府的措施将起多大作用？

陆建华：政府在立法、执法上

是不够有力的，法律的有效性大大降低，譬如把“打擦边球”的违法行为当作改革探索等等。还有一点，政府对分层后果估计太低，教育上有形式主义倾向，使50岁以上的人很难正确对待社会分层的现实。解决社会问题亟需新的反应模式。

何家栋：卞悟先生说过，“市场经济需要公正，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尤其需要公正。旧共同体的解体，应当使共同体所有成员摆脱束缚与失去保护的进程大体同步，这一进程可以快些或慢些，一步到位或步步为营，但决不应使一部分人摆脱了束缚却仍享受保护，另一部分人失去了保护却仍受到束缚。……改革的真正阻力从来都在于旧的利益结构，而改革的真正动力从来也都来自人们对利益结构公正化的追求。”所谓深化改革，就是要解决权利与义务、风险与机会的公正分配问题，铲除特权与无权的壁垒。这个问题解决不好，搞活企业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等，不是流于形式，就是资产流失。

不完善社会组织，社会既无自我保护又无自我约束机制，政府经常处于矛盾的顶端，限制了它的调控能力，一有事变，就处于直接对抗状态。社会分层，可以造成权力落差，保持距离。社会组织是一种减震装置。

陆建华：社会分层之外，还有阶层的流动，现在的流动比毛泽东时代要快得多。阶层的流动必须有

明确的规则，必须有序。现在某些阶层为流动付出的代价太高。

（摘自《中华工商时报》

1995.3.18.）

国家将全面清理 商品定价

据有关部门披露，国家将全面清理商品定价。一是对现行价格政策、价格形式、管理方法进行清理，凡国家已经明确放开的商品价格，要还权于企业，各物价部门和主管部门均不得截留。二是对属于市场短缺、国家鼓励发展的产业，其价格可适当提高，使企业利税达到并超过平均利税率。对于国家限制的产品，其价格应予以严格控制，促其限产、转产。三是按产品牌誉定价，拉开差价。四是研究实行按产品寿命周期定价行为的制度。五是进一步解决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将重要的基础原料垄断性较强或行业集中度高的产品价格并入计划轨道，其它一般性商品并入市场轨道。

（摘自《中国经营报》）



俞德鹏

城乡平等化

——理性与正义的要求

众所周知，中国目前有些地区农民已贫困到每个学期付不起30元左右的学费以致孩子失学的地步，而30元只是城市孩子一个简单玩具的价钱。不怎么为人所知的是，有些农民已贫穷到一辈子无钱迈进医院甚至是乡村赤脚医生的家门。1988年对全国20个县抽样调查表明：农民有病应就诊因支付能力困难而未就诊的占28.7%，有病应住院而未住院的占53.4%，大别山区农民因病死亡前从未就诊的占27%。中国目前有多少温饱问题尚未解决的人口，一说6000万，一说8000万，而实际的人数则肯定比公布的数字要多。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有关数据推算，1991年每日人均收入不足1元钱的农村人口有1.3亿人，难道这在城市里只能买一支普通冰棒或2支较好的香烟的钱就能在农村维持一个人的温饱？

《中国统计年鉴》显示，1992年城市居民的人均生活消费支出是149元，农民的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生活消费支出是用来反映和研究城乡居民生活消费水平高低的关键指标，而人均收入指标则有城乡不

可比因素。因为市民的一切收入均可用来消费，而农民则须把一部分收入用来投资）是62元，市民是农民的2.4倍，1958年则略微下降到2.3倍。现行户籍制度正式确立以后，这一比值就不断地上升，1978年上升至2.9倍。农村改革开始后，农民的生活水平有了较快提高，城乡差别重新缩小，1985年到达最低点2.2倍。自此以后，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又一次落在市民收入的增长之后，城乡生活水平的差别再一次拉大，1992年达到3.1倍，目前这一趋势还在强劲地增长着。而且这些对比是没有剔除城乡价格的不可比因素的结果，如果将市民的无形收入与消费考虑在内，则城乡差别还要大得多。1992年城市职工人均保险福利费用885.5元，相当于职工实际工资的33.3%，再加上相当于职工实际工资20%的无形住房补贴，市民的全部实际消费便是有形消费的1.533倍。也就是说，1992年城乡生活水平的实际差别不是3.1倍，而是4.8倍。4.8倍可不是一个小数字，这意味着农民的生活水平即使每隔10年便翻一番，

也要20多年才能赶上目前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换言之，中国农民的生活水平比市民的生活水平至少落后了20年。

尽管这一事实令大减了40多年要缩小城乡差别的国人汗颜，但学术界对此却大体上无异议，只是对这事实的成因及其合理性有不同的说法。比较流行的观点认为，目前中国城乡事实上的不平等状况是旧社会城乡对立与城乡差别的延续，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起步之时不可避免的社会现象，它的存在有其历史必然性与合理性，消灭城乡差别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在社会物质条件尚未满足之前如果刻意去追求城乡平等，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

初看起来，这一观点十分有道理。但只要我们稍微思考一下国内外城乡差别发展的历程，就不能不对这一观点的正确性产生怀疑。一些国家城乡生活水平之比不超过2倍，比如日本工业化初期（1885—1919）的城乡居民生活水平之比仅为1.3倍，工业化中期（1920—1964）亦只有1.5倍，可是为什么社会主义中国的城乡差别会高达3倍、4倍甚至5倍呢？如果城乡差别是旧社会城乡差别的延续，可是为什么在新中国成立的40年之后这一差别还要延续并不断扩大呢？实际上，上述观点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这就是把自然历史因素造成的城乡差别与人为制度因素造成的城乡差

别混为一谈。城乡事实上的不平等的确有其历史必然性，的确是每一个国家发展初期难以避免的社会现象，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一切城乡差别都是自然历史因素造成的。自然历史因素只需要对那一部分正常的城乡差别负责，而如果一个国家的城乡差别超出了正常水平，那么超出的部分则是人为制度难辞其咎的。因此，假如我们把中国目前4.8倍左右的城乡居民生活水平之比中的2.0倍归于自然历史因素的名下的话，那么剩下的2.8倍城乡差别就只能算是现行户籍制度造成的了。尽管任何社会制度的存在都有某种历史必然性，都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社会制度的这种历史必然性毕竟还不同于社会整体趋势中所体现出来的那种历史必然性，因为后者是纯客观的，而前者则是人为设计与安排的结果。故对社会制度而言，就有合理与不合理之分，正义与非正义之分。因而，城乡差别之成因中的历史必然性并不能掩盖与抵消现行户籍制度牺牲权利平等与机会均等的不合理性与非正义性，更不能成为后者的替罪羊。所以，我们决不应该把自然历史因素造成的城乡事实上的不平等与现行户籍制度对城乡不平等的加重混为一谈。承认现阶段城乡不平等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历史必然性，不等于认可现行户籍制度的“合理性”，恢复城乡权利平等与机会均等不等于追求城乡绝对意义上的平

等。如果我们因反对刻意追求城乡财富均等就放弃了对城乡权利平等与机会均等的基本追求，那就大错特错了。

约翰·罗尔斯在其《正义论》的开篇便说：“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一种理论，无论它多么精致和简洁，只要它不真实，就必须加以拒绝或修正；同样，某种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现行户籍制度处处显示出对城市居民的优待与对农村人口的歧视，它使占全国人口83%的公民普遍处于一种权利十分微弱的状态，并使他们饱受由此而引起的各种痛苦、不幸、贫困、愚

昧与落后的折磨，其不合理性与非正义性已经十分明显。因此，改革现行户籍制度，推进城乡平等化进程是人类理性与正义的要求。

今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总目标业已确立。市场经济实际上就是一个标准的契约社会，公平、平等、自愿的契约原则是与先天等级、世袭身分、法定特权等等东西水火不相容的。因此，改革现行户籍制度，统一社会身分，恢复城乡居民权利平等与机会均等，既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本来要求，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

（摘自《中国国情国力》

1995.2.）

李伯勇谈我国“九五”工资改革

劳动部部长李伯勇最近谈到“九五”期间我国工资改革的思路。他指出，在工资机制改革中，对实行现代企业制度的国有企业，政府要放开对其工资总额的行政控制，由企业运用包括集体协商谈判在内的各种方式，自主决定工资水平和分配方式；对暂不具备条件的国有企业，继续实行各种形式的工效挂钩办法，并创造条件向新机制过渡；非国有企业要力争普及实现自主决定工资水平和分配方式；到“九五”后期，基本完成工资自由市场决定

机制的改革。李伯勇进一步明确，企业在确定的工资总额范围内，拥有自主分配权。企业可自主实行包括岗位技能工资在内的多种分配形式和工资标准，以劳动技能、责任、强度、条件和贡献等基本要素确定劳动报酬；国有企业要逐步实行经营者年薪制，将经营者工资收入同职工收入分离开来，企业生产经营成果、责任、风险和资产保值相联系，建立收入分配的内部平衡机制。

（摘自《江苏经济报》）

车臣与俄罗斯的恩恩怨怨

文 林

车臣共和国是俄罗斯89个联邦主体之一。位于山峦起伏、丛林密布的北高加索，面积近2万平方公里，首府格罗兹尼。车臣人口约120万，其中车臣人作为主体民族占52%，俄罗斯人占29%，印古什人占12%，此外还有亚美尼亚人、乌克兰人、库梅克人等。车臣人信奉伊斯兰教，以尚武、善战闻名。

顽强抗俄半世纪 车臣与俄罗斯的关系可以追溯到18世纪。当时，沙皇俄国正积极推行南进扩张战略，高加索地区首当其冲，成为俄国同土耳其、波斯激烈争夺的对象。1722年彼得一世的军队开进尚处于部落首领分割状态的车臣，在那里修路筑堡，建立哥萨克人村镇，以图永久将车臣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自古武勇自恃的车臣人不甘屈服于沙皇的统治，不断奋起反抗，并联合该地区其他民族一道同沙皇军队进行了长期斗争。直至19世纪初，沙皇尚未完全征服包括车臣在内的高加索地区。随着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卡拉巴赫先后并入俄罗斯，沙俄为了打通与外高加索的通道，加紧了对北高加索的武力征服。

车臣人的抗俄斗争也随之高涨。从1817年至1864年，车臣同其他高加索民族一起同俄国进行了长期战争，即历史上著名的“高加索战争”。这场战争持续了近半个世纪，俄罗斯为此耗费了大量的物力、财力、人力，损失惨重。1859年，车臣被沙俄彻底打败，并入俄国版图。

离乡背井十余年 十月革命后，车臣与相邻的印古什一起并入苏联的戈尔斯克共和国，不久又分离出来，各自成为自治区。30年代两自治区合并，1936年改为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该共和国的一部分被德国占领。1943至1944年间，苏联政府以车臣共和国“叛变和同敌人合作”为由发布命令，撤销自治共和国，将车臣人和印古什人强行迁往亚洲北端和中亚（车臣现总统杜达耶夫就是刚一出生就随父母迁往异土他乡的）。在新居住地，车臣人继续受到歧视，不仅被同其他民族隔离开来，而且被剥夺了苏联公民所应享有的一些社会权利。如不许开办用车臣语教学的学校，等等。

1957年，苏联政府恢复了车臣

的名誉，重新成立了车臣—印古什共和国，同时废除了不许车臣人返回原籍的禁令。车臣人虽得以陆续重返故里，但他们的自尊心已受到极大的伤害。尤其是当他们回到车臣故里，发现迁来了大批的俄罗斯和其他族移民，家乡的村镇和建筑物的名称也大多被更换，原自治共和国的版图也未恢复原状，车臣人对俄罗斯的不满就更深了。

分庭抗礼三春秋 1991年10月27日，主张“车臣人民不再俯首听命”的杜达耶夫当选车臣—印古什总统。同年11月2日，车臣族宣布脱离俄联邦，成立独立的车臣共和国。此举立即引起俄联邦中央的强烈反对。此后，车臣一直不将自己视为俄联成员，拒签签署联邦条约和参加全民公决、议会选举等全俄性活动。俄罗斯当局对车臣的独立也一直未予承认。

俄罗斯曾试图与车臣签订双边条约，以给车臣更大的自主权换取车臣放弃独立，但遭到杜达耶夫的拒绝。于是，俄又改用以车臣人制车臣人的策略，靠暗中扶持杜达耶夫的反派来达到推翻杜达耶夫的目的，但仍未奏效。在这种情况下，俄联邦于1994年12月11日直接派兵进入车臣。俄军现已控制了车臣首府格罗兹尼，但要解决车臣问题，看来尚需时日。

（摘自《世界知识》

1995.2.）

波黑战火何时了？

董武

民族分裂 内战爆发

3年的波黑内战，曲曲折折，反反复复，'95岁首虽一度和平有望，但很快便被穆塞双方隆隆的枪炮声所淹没。这场内战何时能够结束，已无人敢下断言。

波黑全称为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是前南斯拉夫

6个自治共和国之一。境内有三个民族，穆斯林族占有43.7%，信伊斯兰教；塞尔维亚族占有31.3%，信东正教；克罗地亚族占有17.7%，信天主教。历史上各民族间的矛盾和隔阂就很深，南斯拉夫分裂后，民族冲突便一发不可收拾。1989年，受东欧剧变的影响，南共联盟宣布放弃“一党专政”，搞“多党制”。1991年6月25日，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宣布独立。马其顿、波黑紧随其后。塞尔维亚和黑山组成南联盟。南斯拉夫一分为五，共同生活的民族走向分裂。

波黑在1990年大选后，由三个民族政党联合执政。1991年10月15日，波黑穆、克两族议员在塞族议员抵制的情况下，强行通过了“关于建立波黑主权问题的备忘录”，准备独立。对此塞族人坚决反对，号

势日趋紧张。此后，在欧共体的调解下，三方就波黑边界不变，以三个民族实体为基础组成独立的国家达成了协议。但国体问题上分歧严重，穆族主张建立统一的国家，克族主张成立联邦国家，塞族则坚持松散的邦联制国家，并要求自己有权同南斯拉夫结成邦联。1992年3月3日，在塞族抵制的情况下，波黑举行全民公决，赞成独立。1992年4月，美国等西方国家相继承认波黑独立。塞族则宣布脱离波黑成立波黑塞尔维亚共和国。自此，三方冲突爆发，全面内战开始。

从军事上看，塞族占有明显优势，一直占据约70%的土地，克族占有20%的土地，穆族仅占10%土地。西方国家在波黑内战爆发后将战争罪责扣在南联盟塞尔维亚共和国头上，1992年5月31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对南斯拉夫实行全面制裁。1992年6月29日，联合国又决定向波黑派遣维和部队。波黑战争现已持续35个月，20万人丧生，几十万人受伤，近300万人沦为难民，物质损失上千亿美元。战争初期，穆、克两族为一方共对塞族，1993年穆、克矛盾上升并发生激战，从而出现三族混战局面。1994年，穆、克联邦成立，穆、塞又成了主要交战方。

欧盟调停 战火未熄

波黑内战爆发后，欧洲联盟(原欧共体)便开始进行调解，无数次和

谈，凡十个停火协议基本都是在欧盟斡旋下达成的。争夺土地是三方的主要目标，因此每个和平方案中的版图划分便成了关键的内容。1993年1月，万斯和欧文提出了将波黑建成10个省组成的分权制国家的和平方案。根据该方案，塞族分得43%的土地，穆族为38%，并与克族共占第10省，克族占15%，萨拉热窝将成为非军事化开放区。穆、克两族接受了该方案，塞族认为方案不公正，无法接受。尽管又经一次有利于塞族的部分修改，塞族领导人卡拉季奇也在方案上签了字，但塞族议会两次表决和一次全民公决都拒绝接受这一方案。1993年8月20日，欧洲联盟又推出了欧文—斯托尔滕贝格方案。该方案将波黑一分为三，组成三个制宪共和国联盟，这与此前不久塞、克两族提出的三分波黑的主张基本类似。该方案规定穆族得到31%的土地，塞族52%，克族17%。塞、克两族接受，穆族反对。1993年11月，欧洲联盟又推出法、德提出的和平新建议，要求塞族再让出3—4%的领土，以换取逐步取消对南联盟的制裁。1993年12月21—23日的波黑和谈中，塞、克两族同意再向穆族作部分领土让步，使穆族的领土由31%增至33.3%，但穆族以土地“质量不好”而拒绝接受和平计划。波黑在一片战火声中度过了圣诞节和新年。

美俄插手 形势剧变

1994年来临之际，波黑战火并未停熄，这表明欧盟的调停已难奏效。此前一直冷眼旁观的美国一改初衷，开始积极插手波黑事务。美国一进来便执行“扬穆抑塞”的政策，一是1994年2月绕过联合国以北约的名义向塞族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在2月20日前将重武器撤离萨拉热窝20公里以外，否则就将对塞族进行空袭；二是1994年3月美国一手策划成立了“穆克联邦”以图共同对付塞族。美国的政策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波黑的政治形势，穆、克休战共对塞族，穆族气焰开始嚣张，态度更趋强硬。

北约的“最后通牒”一发出，原来旁观而无空插手的俄罗斯开始站出来，一方面大声宣布北约的“最后通牒”非法，并宣称欧洲事务必须有俄参加，同时又派特使出使前南地区斡旋，做塞族的工作，最后导致北约的空袭计划流产。俄又派维和部队进驻萨拉热窝。

美俄的介入使穆、塞双方的背后各有大国支持，形势剧变。此时，穆斯林开始试图以战争夺回土地，从而导致了1994年4月的“戈拉日代危机”，北约借此对塞军进行了3次空袭。

五国仲裁 卡特斡旋

1994年7月5日，由美、俄、英、法、德5国代表组成的波黑问

题国际联络小组，根据欧盟提出的51:49的领土划分比例，推出了解决波黑危机的“五国和平方案。”此方案带有“最后通牒”性质，要求冲突各方必须接受，并公布了严厉的“惩罚”措施。由于该方案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美国的战略意图，对穆族有利，所以穆克联邦宣布接受。但该方案在版图划分上对塞族明显不利，因此塞族几经讨论并进行全民公决，最后还是拒绝了五国方案。1994年11月11日，在塞族仍拒绝和平方案的情况下，美国下令撤出在亚得里亚海参与禁运的美国舰只。这一举措遭到俄、英、法三国的反对，但对穆族却是一个鼓舞。1994年10月下旬，穆族在比哈奇地区向塞军发起了强大攻势，一举攻占400多平方公里的塞族土地。但两周后，塞军大举反攻，收复了失地并兵临比哈奇城下。比哈奇危机为世人瞩目，也成了形势转变的起点。美国的波黑政策开始出现了微妙的变化。1994年12月初，五国外长会议上，美国终于表示塞族有权与南斯拉夫结成邦联，在坚持原有领土划分比例的情况下，对具体划分可在双方实现和平后进行修改。塞族表示接受最新和平方案，但穆族拒绝。

1994年末将至，在内外强烈的和平呼声中，穆族决定作出6项重大让步，并邀请美国前总统卡特赴波黑进行斡旋，以打破僵局。1994年12月18—21日，卡特在波黑各